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亚洲“共有的历史”

徐国琦

【摘要】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亚洲产生了巨大影响,亚洲对一战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战的发生及由此所导致的一系列国际秩序的变化,成为亚洲历史进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里程碑和转折点。亚洲各国尽管历史各异,但一战无疑成为影响亚洲历史命运极其深远的一段共有的历史。通过“共有历史”角度透视亚洲与“一战”的关系,可以更为明晰地描述和分析亚洲与世界接轨及参与重建西方文明的精彩历史,让我们得以清楚地意识到亚洲与一战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亚洲史乃至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

【关键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日本;越南;印度;朝鲜;共有的历史;国际秩序

【作者简介】徐国琦,香港大学嘉里集团讲席教授。

【原文出处】《文史哲》(济南),2018.4.5~19

公元1914年,所谓“大战争”(Great War)在欧洲爆发。这场大战开始时被亚洲人普遍称作“欧战”,因为开战伊始,似乎只是一场西方文明的内战。然而,就是这场发生在千里之遥,似乎与亚洲关联不大的战争,不仅成为后来历史书上著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或“大战”),成为人类文明史的重要事件,而且对亚洲国家和人民而言,也是一场影响极其深远的事件。一是因为亚洲国家的积极介入,亚洲让所谓的“大战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二是因为“大战争”的爆发及其影响,“大战”成为亚洲历史和发展进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

一战对亚洲不仅有重要历史意义,还有深刻的现实影响。在一战爆发一百周年的2014年初,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公开把当前的中日关系同一战爆发前的英德关系相提并论,暗示中国如同当年的德国一样,充满侵略性。中国外长王毅在同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期间的记者招待会上也毫不示弱,宣称2014年不是1914年,更不是1894年,日本与其把一战前德国的所作所为作为对中国的警示,其实更应该以二战后对战争彻底反省的德国作为榜样^①。

在一战爆发百年后,学者们对一战的研究已可谓卷帙浩繁,然而遗憾的是,学术界迄今对一战及其

建立的战后秩序对亚洲国家的集体影响的研究尚付阙如。值此一战结束百年之际,特撰此文,并以“共有历史”方法的视野,来透视一战对中国、日本、印度、越南以及朝鲜等国的影响,尤其侧重分析一战如何成为这些国家的“共有历史”。在进入正题之前,有必要先解释何谓“共有的历史”。

“共有的历史”(shared history)研究方法是笔者近几年在西方学术界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的一个新视野,主要有下述几个特点:其一,该范式的核心是“共有”,着眼于人类共同历史旅程及追求;其二,彻底跳出民族—国家视野的学术范畴,尽量着眼于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其三,强调个人及非政府机构的角色和作用。换句话说,“共有的历史”方法是在西方特别是美国近年来得到广泛注意的国际史方法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两者可谓互补和相得益彰。作为史学方法的“国际史”追求及旨趣就是要跨学科、踏国别、兼容并包、融会贯通。国际史尤其强调“自下而上”(bottom-up)的方法,而非如传统的外交史、政治史。“文化”因素、“弱势群体”、人类共同的追求等课题常成为国际史研究的突破口^②。为了不重复笔者在其他地方的观点,这里想强调的是“共有历史”与“国际史/跨国史”之间的密切关联和不同关怀。

用“共有的历史”方法来探讨亚洲与第一次世界

大战的关系,是学术上的重大突破,让我们得以在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方面另辟蹊径,可以读到一部全新的与众不同的和见解独到的亚洲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关系史。更重要的是,这一方法及视野在帮助我们重新认识过去的基础上,可以提供亚洲各国人民共同谱写和谐未来关系的重要历史借鉴。

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以中国、日本、越南、印度、朝鲜为中心,来探讨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如何成为亚洲共有的历史。值此一战结束百年之际,希望此文能够帮助亚洲国家和世界各国一起反思这场战争的影响、意义及一战在世界史和亚洲历史中的地位。本文的旨趣不仅在于揭示一战成为亚洲共有历史的重要一章,也试图填补亚洲学者在这方面研究的令人遗憾的空白,并力图把一战研究带入亚洲历史视野,通过恢复亚洲在一战中的历史地位来进一步提高亚洲与一战关系课题的研究水平^③。

一、“大战”的爆发与亚洲各国的大机遇

表面看来,在一战期间,中国、日本、印度、越南以及朝鲜诸国家之间,似乎没有多少共同联系。日本为当时正在兴起的大国,中国正处于承前启后、奋发图强的巨大变革之际,印度为英国的殖民地,当时被称为印度支那的越南为法国的殖民地,朝鲜则处于日本的铁蹄之下。但仔细分析起来,这些国家则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和地域方面的密切联系。首先,它们是邻国;其次,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很快把这些国家变成某种意义上的“佛教共同体”;再次,日本、越南、朝鲜在历史上都受中国文化影响甚深,所以中国、日本、越南、朝鲜又可称为“儒家文明”共同体;更重要的是,在一战爆发之后,这些国家都或先或后地在不同程度上视一战及其可能导致的新国际秩序为影响其历史进程和国际地位的重要机遇,并将一战变成它们“共有的历史”。

先说印度与越南。两国分别作为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在一战爆发后,当然无法置身事外,必须为宗主国出钱、出人、出力。为了宗主国的大战争,印度在一战期间,为英帝国提供了一百万人的兵力及

劳工,无数印度人在欧洲和中东战场为大英帝国出生入死。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印度的这些牺牲固然不足为奇,但令人惊讶的是,印度的精英们几乎一边倒地不遗余力地支持英国的战争。因为他们认为,一战的爆发为印度寻求自治和提高民族凝聚力等方面提供了巨大机会,他们希望通过大力支持英国,来换取战后英国对印度自治的首肯。因此一战的爆发以及英国很快寻求印度支持是印度历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长期以来,身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缺乏民族觉醒,没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对国际社会更是缺乏理解和认识,在一战爆发的1914年,在印度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所谓印度民族,有的只是在大英帝国控制下的不同种姓,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生活在所谓的印度,没有真正凝聚成一个民族所共有的价值。印度政治家也是印度独立后第一任总理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 1889—1976)曾经表示:长期以来直到1914年,印度政治还是“十分无聊”^④。

一战的爆发,把如同一潭死水的印度搅得风生水起,战争不仅一举把印度拉到国际社会里面,并让印度的精英们有机会开始全面反思印度的民族认同和印度在国际的地位。一战因此为印度精英们提供了拯救印度民族之机。美国著名印度史学者斯坦利·沃尔珀特(Stanley Wolpert)这样写道:一战对印度的影响在于促成印度的政治觉醒和增加对自身价值的自信^⑤。印度旅英学者山塔努·达斯(Santanu Das)就指出,对印度的精英群体而言,一战是一个巨大机遇^⑥。诚如提莫希·旺噶德(Timothy C. Winegard)所写:“一战对于大英联邦成员国20世纪的历史而言,比二战影响更大。这场战争彻底改变了大英帝国的版图。由于这些成员国的参战,加速了他们实现文化和法理上建立(独立)民族的进程。”^⑦一战也因此被称为所谓“印度的机会”^⑧。

难怪在一战中,几乎所有印度政治家都支持这场战争,并为战争提供各种支持。印度精英们对大英帝国的求援尤其表示欢迎。担任1914年印度国民大会党主席的布彭德冉纳特·巴苏(Bhupendranath Basu)在1914年9月写道:在大战爆发以前,印度陷在

各种内部纠纷之中。“然后这场欧战爆发了。突然间,所有的疑问和迟疑都一扫而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在目前英国的危急存亡之秋,[印度]要与英国同舟共济。[对印度来说]一个巨大机会已经来临,就是印度要借机要求在[大英]帝国内的平等地位,并[通过参战]证明它值得平等地位”。印度的精英们希望通过为大英帝国在战争中作出巨大牺牲来展示“旧的秩序必须废弃,基于互信和互相理解的新的秩序应该建立,在新秩序下,一个比过去更光明和更幸福的时代将会出现。如果[印度]在战场上能[与英国]同仇敌忾,那么,东方和西方,印度和英国,[未来]将会携手前行”^⑤。布彭德冉纳特·巴苏甚至进一步宣称:一战爆发后,“我们的时刻来临;我们必须一改惰性,让我们撩起衣袖,奋力奔向目标。这是一个足以称为我们最高理想的目标……我们开始感觉到印度人民的力量和与日俱增的凝聚力。印度已经意识到她必须成为[大英]帝国的重要和平等一员。印度已经把握住她当之无愧的伟大机遇”^⑥。这里所谓的伟大机遇当然是指印度通过全力以赴支援大英帝国的战争来实现自治目标。1915年担任印度国大党主席的印度著名政治家S.P.辛哈(S.P.Sinha)同样敦促印度人们把握机会,实现自治。他说印度人所要的自治应该是美国林肯总统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的真正自治。S.P.辛哈因此强调:“我们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大战,这场战争给印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一个机遇来展示,印度军人即使面对世界上最好的军队,仍然英勇奋战,不屈不挠,同时也向世人宣告印度人不论其阶级、信仰、民族[是否各异],已经在高涨热情的驱使下,开始以一个共同民族面目屹立于东方。”他进一步希望由于印度人为战争作出巨大牺牲,“战后英国会让印度自治”^⑦。

不仅印度的政治家们对一战爆发和可能给印度带来巨大机遇而欢欣鼓舞,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一度对一战也抱有幻想。泰戈尔在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为亚洲首位获此殊荣的作家。在一战期间他在英国和西方的声名很高,影响甚大。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是英国一战中最著名的战争诗人,并最终捐躯一战战场。他在最后一次离开家乡奔赴前线时,告诉母亲的最

后一句话就是引用的泰戈尔的诗句:“就此别过,并以这句话告别吧:我之所见不可能被超越。”^⑧泰戈尔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泰戈尔虽在一战后强烈反对西方文明,但在欧战爆发伊始,他也是对战争充满期待。他在诗中写道:“我此刻站在您的面前——请帮我穿上铠甲!让艰难险阻成为烈火来锤炼我的生命。尽管我的心在痛苦中跳动——但它却在敲响胜利之鼓。”^⑨

为了实现所谓的“印度时刻”,一些印度人甚至要求印度要在这场大战中在“心灵中”与英国休戚与共^⑩。后来成为印度独立之父的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 K.Gandhi, 1869-1948)当时就宣称:“为祖国和大英帝国故,[他]愿意[为战争]效力。”并诚恳向英国当局表示要为英国募集印度人医疗队和印度士兵到前线服务^⑪。但英国当局没有理会甘地,没有把甘地的一片好心当回事。尽管如此,甘地仍不改初衷。当印度自治运动领导人之一的安妮·贝桑特(Annie Besant)寻求甘地支持该运动时,甘地告诉她:“你不信任英国人,但我不认同这样做,我不会在战争期间参与任何反英活动。”显然,甘地当时对英国当局抱有很大幻想,对战争可能给印度提供巨大机会很有信心,认为“如果印度全力支持英国的战争,战争结束后,印度将会得到一个自治政府”^⑫。与很多急于求成的印度精英不同的是,甘地甚至告诫大家要慢慢来,不要想一蹴而就,强调“在战争结束前,[我们]还是应该把目光放远大点,不要急于求成”^⑬。

印度最著名和最有影响的政治团体是建立于1885年的印度国民大会党。但直到一战爆发,该组织既无资源也缺乏政治眼光来帮助印度实现民族独立。它甚至不敢挑战英国统治印度的合法性,充其量只是致力于争取印度人在大英帝国内的一些权益而已。但一战爆发后,国大党似乎脱胎换骨,开始对印度民族独立运动表示浓厚兴趣,并把支持英国战争同印度自治相提并论^⑭。从这一背景下我们就不难理解在1910年到1916年任印度总督的哈丁爵士(Lord Hardinge)的观察了。他看到大战甫一爆发,印度人中的有识之士立即搁置内争,“不为殖民政府添麻烦”^⑮。早在1914年12月,国大党就作出决议,

有历史”。

要理解为什么日本如此不惜血本在中国土地上对付德国,我们必须检视自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国策。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就一心要加入西方列强阵营。在经过二十余年的励精图治后,在1894-1895年间的甲午一战,日本一举击败中国,一跃成为东亚强国,但在德、俄、法三国干涉还辽后,日本不仅一心要一雪前耻,并力争成为世界强国。然而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却不容日本置喙。一战的爆发,正可谓日本的千载难逢之机,日本意欲一举将德国赶出亚洲,并趁列强在欧洲火并,无暇他顾之际,攫取中国为其后院。难怪对“大战争”的爆发,日本如此欢欣鼓舞,称欧战的爆发实乃“天助”^②。青岛到手后,日本在1915年初立即向中国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即是日本利用一战来实现其对华野心的明证。

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要考察中国和日本如何将一战爆发视为机遇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把两个国家放在一起考察,因为它们互为因果,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把一战作为中国和日本的“共有的历史”。中国之所以在甲午中日战争后,开始奋发图强,主要就是日本人把中国打醒,如同梁启超所说:“唤醒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也!”^③中国精英们对一战爆发的反应,之所以且喜且惧,还是因为日本的因素。一战对中国来说则可称之为“危机”,“危”险加“机”会。危险主要在于日本可能乘列强决战于欧洲战场时,强迫中国臣服日本。但一战可能导致对中国不利的现成国际体系崩溃,在一战废墟上诞生的新的国际秩序也许对中国比较有利,中国或许甚至可以在尚未成型的世界新秩序中注入自己的烙印和声音,进而收复国家主权和提供中国国际地位。总之,在当时以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精英分子看来,这场大战争将改变国际体系,并有可能帮助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平等一员。这一切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机会。

与此同时,日本对中国的昭然若揭的野心更加深了中国人对一战的“危”“机”意识。如果说日本在1895年击败中国导致中国产生国家认同危机,那么它在1915年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则不仅

激发起中国人的强烈的民族意识,还直接促成了中国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首要明确外交目标:参加战后和平会议,以便收复被日本非法夺取的青岛及其他中国主权。在1915年,中国朝野对于中国应出席战后和平会议的目标达成共识并得到了不少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精英的普遍支持。唯一的挑战是如何赢得出席会议的席位。正是由于参加和会的考量,中国政府力争参战,以此来保证中国获得和会一席之地。

综上所述,如果不从“共有历史”的视野出发,我们无法全面和深入理解中国与日本之间因为一战而发生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无法理解一战与印度、越南、朝鲜等国的关联。唯有从“共有历史”的角度,我们才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战的爆发,无疑成为这五个国家一段独特的共有经历。他们都或多或少视一战及其影响为其重要机遇。

二、中国、印度和越南血染的共同历程

如果说,亚洲精英们在亚洲各国对一战所作的反应和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作为平民百姓的100万印度人、14万华工、近10万越南人,背井离乡来到欧洲战场,他们在民族意识的觉醒,在反思本民族与西方文明的异同中,则发挥了同样重要的影响。这些亚洲人跨洋过海,远赴法国,成为英国和法国战争机器的一部分。在许多人眼里,他们也许只是目不识丁、胸无大志的苦力,也许他们到欧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谋生。在欧洲,他们确实吃尽了苦,出尽了力。但是,他们的出征是同本国及世界的命运密切相关。他们是亚洲国家放眼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社会的先行者,并直接参与创造亚洲及西方的历史。因为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的可歌可泣的旅欧经历,亚洲的精英们可以义正词严地在巴黎和会上要求国际社会还亚洲国家以公道。因为印度人、中国人、印度支那(越南)人的源源不断地到来,英法诸国在大战危急关头,可以免去人力资源匮乏的后顾之忧。

中国人、印度人、越南人在欧洲战场上的直接经历,无疑拓宽了他们的世界观,让他们有机会思考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印度对战争的巨大贡献让印度人意识到他们自身的力量,促成他们的政治觉醒,提高

其政治信心。印度和越南作为英法殖民地,成为亚洲人在一战欧洲战场直接参战的重要成员^⑧。尽管印度人在欧洲并未得到公平对待,但印度无疑是大英帝国的战争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大英帝国及盟国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丰富的人力资源”^⑨。莫里斯·巴瑞斯(Maurice Barres)写道,当印度士兵于1914年9月到达法国时,他们成为“参战国家中最令人惊奇的一员”。确实,诚如英国一份官方报告所写,“很少人预见到有一天印度军队注定为了自由的事业会同英军、大英帝国成员国、盟国在三大洲并肩作战”^⑩。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印度士兵会知道为什么而战吗?他们会对这场大战产生什么印象?

1914年10月10日,欧洲战场的印军指挥官詹姆斯·威尔考克斯(James Willcocks)在给印军的命令中告诫印度人:你们即将同德军作战,德国有悠久的历史,但比不上印度的历史悠久,请牢记,许多世纪以来你们一直是伟大武士之后代,你们将会为自己的民族再创光荣,在同英军和法军共同作战中,你们必将创造历史。他说:“作为国王陛下驰骋欧洲战场的首批印度将士,你们将有幸向世人证明你们不折不扣地拥有你们先人的尚武本色并当之无愧。在这场战争中,你们要切切铭记你们的宗教信仰之教诲:为职责不惜牺牲生命是最高荣誉。……你们是为你们的宗教而战,为[大英]国王陛下而战。历史会记住印度人[在这次大战中]的功绩,你们的子孙们会为你们的作为而自豪。”^⑪

印度军队在一战中驰骋法国、比利时、中东战场、非洲以及青岛,其在法国的军队一度达到8.5万名士兵之多,外加2.6万名辅助人员。尽管有些英国人对印度士兵的战斗力的评价不高,认为如果没有英国军官的指挥,印度士兵就会像“没有牧羊人的一群羊”^⑫。但是这场战争对印度人则至关重要,这场战争打开了他们的视野,为他们提供了反思“何为印度”“何为印度人”的机会,让他们得以思考印度的前途及印度人的集体命运。印度著名诗人艾哈玛德·伊寇巴尔(Ahmed Iqbal)的诗句就反映了当时印度精英们的心理:“世界会见证,当我的心中掀起无数亟于表达的风景时,我的沉默掩盖了期望的种子。”^⑬这

两句诗同鲁迅的著名诗句“于无声处听惊雷”所表达的意境是不谋而合的。

印度人直接参加一战,无疑会提高印度民族的自信心,唤起印度人的政治觉醒和民族意识。一位印度精英这样表示:“战争给我们的改变很大,它改变了我们看待印度与英国的视角。”^⑭一位参战的印度士兵也指出:“当我们见到不同民族的人并了解他们的看法后,我们开始抗议英国人制造的白种人和黑种人之间的不公平和不平等。”^⑮一战期间在欧洲参战的印军上尉阿玛·辛格(Amar Singh)在日记中写道,参战对他来说不仅是责任,也是宣示其个人的荣誉和民族感。他认为,由于印度的参战,印度的地位在战后相应地会得到提高。阿玛·辛格告诉印度军人说,“这是我们印度人第一次有幸在欧洲土地上同欧洲人作战”,他要求他们不辱使命。1915年10月阿玛·辛格在日记中写道,印度士兵必须忍辱负重,因为他们的表现“与印度的荣誉息息相连。在战后印度必将得到英国巨大的让步。没有这场战争,这种让步在几年内是很难实现的”。在欧洲的直接观察,让印度人思考印度如何可以进步和向欧洲学习。早在1914年11月,阿玛·辛格就在日记中写道:“自从我来到法国后,我一直欣赏和研究法国人的马路。”1915年6月他写道:“我对法国的森林和马路印象极其深刻,经常想,在我的家乡[印度],我能在这方面做点什么。”^⑯

同印度人一样,越南人在一战期间也曾同法国人并肩作战。一名越南人这样说道:“在战场上我们丝毫不比法国人逊色。我们死伤惨重。”^⑰越南在一战中同法国提供了近5万的军队和近5万名劳工,1548名越南劳工死在法国,1797名越南士兵捐躯战场。越南士兵和劳工在欧洲虽然经历了各种挑战,但他们在那里得以观察和学习不同的文明和文化,并有机会同法国人、美国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近距离接触。一名越南士兵写道,根据他的观察,法国军人不怎么强大^⑱。另外不少越南工人有机会同华工一起工作,但法国政府不想让越南人与华工来往太密切,以免他们受到华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⑲。

法国是越南的宗主国,在越南,法国人同生活在

其殖民统治下的越南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但在一战期间的法国,这些来到法国的越南人不仅为保卫法国而战,甚至还有机会同法国妇女交往并发生亲密关系,乃至谈婚论嫁并结婚成家。一名越南士兵在信中写道,在法国他有机会在周末同法国女人吊膀子,如同他在越南同越南女人吊膀子那样^①。出于维持法国在越南的殖民地位的政治考量,法国政府当然不想让法国女人同越南人成为男女朋友。尽管如此,仍然有不少在法国的越南人同法国女人有肉体关系。截至1918年,至少有250名越南人同法国女人结婚,有1363名越南人同法国女人同居^②。不少越南人赋予他们同法国女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一种深层的政治含义。他们在向朋友谈及自己的艳遇时,经常提到这是法国为其在越南的殖民罪行得到的报应。法国人在越南将当地妇女当情妇,现在越南人则正好可以在法国与法国女人调情。在这些越南人看来,他们与法国女人的性关系就像是一种政治报复或复仇^③。对他们来说,在越南的法国女人也许不可碰,但在法国本土,他们有的是机会找法国女人。

越南人在法国的各种经历让他们感到自己并不比法国人差,他们开始质疑法国统治越南的合法性。这种质疑在他们回到越南后无疑会对法国在那里的殖民统治造成潜在威胁^④。专门研究越南人与一战关系的学者克木蓝·武-赫尔(Kimloan Vu-Hill)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标志,开启了越南历史的新篇章。出于需要,法国被迫放弃过去不准越南人大批进入法国劳动力市场的做法,导致一战期间不少越南人来到法国并且同法国人一道做工劳动,并肩作战。这一特殊的旅程和经历,无疑把这些人大多数素来无知的旅法越南农民转变为具有新技能、眼光开阔的新人。他们对自己国家和对整个世界都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这些越南人在法国的一战经历,为不少越南人带来了第一手对法国政治、社会的观察,帮助他们意识到法国并非不可一世和无法战胜的。对这些越南人而言,有关法国优越感的迷思可谓烟消云散了,他们当然也就不再安于接受法国统治越南的现状了^⑤。

华工的欧洲旅程和经历,同样跟中国命运息息相关。一战期间,14万华工在英法两国政府的征召和中国政府的安排下,远涉重洋,作为苦力来到战火纷飞的欧洲,为协约国集团的所谓“文明之战”贡献“苦”与“力”。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东西方交流的重要环节^⑥。华工虽然来自中国,但他们的历史却属于整个世界。一战期间中国的“以工代兵”策略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胆识、有目的、有远见地加入国际社会,是东方大国参与拯救西方文明的中外合作大事件。14万华工不仅仅是14万士兵,也是中国的14万使者。那些大战期间在欧洲战壕、工厂和港口工作的华人,在受雇到法国之前,大多连自己的村庄都没踏出过。现在他们来到欧洲,所谓西方文明的中心,但是文明的西方已深陷在可怕的杀戮中。它无法炫耀其和平时期的文化、学术或政治盛况,事实上它所暴露的只有其最丑陋、最野蛮的一面:极其残酷的相互毁灭和疯狂屠杀。诚如基督教青年会记录所报告的:“把东方带来与西方文明接触,是这场世界战争中最了不起的组成部分之一。”^⑦大战期间及结束之际,华工发现欧洲并非天堂,而是废墟。白人的虚情假意和所谓的基督文明正被一层层剥去,在昏暗的灯光下乏善可陈^⑧。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对于在一战期间来到欧洲的亚洲人而言,东方与西方不只是接触了,而且是广泛全面的接触。最有意思的是,东、西方交汇是透过这批为数甚多的平民百姓来进行的,当他们踏上欧洲征途时,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国际关系,不明白民族认同或民族独立。他们经常被西方人蔑称为“苦力”“中国佬”或“支那佬”“未开化的人”,但就是这些亚洲人不仅对盟国的战争作出重大贡献,同时也在东西文明之间承担了重要的信使角色。通过检视亚洲人战争期间的工作和经历,我们可以对东西文明之间的差异和融合取得新的认识,对战争及随后在亚洲及世界各国的发展有更深刻的了解。此外,在大战期间亚洲人不仅亲眼目睹了一场“大战争”,他们也积极参与其中。遗憾的是,这段故事在一战爆发一百年之后仍旧在亚洲和世界上层为人知。

虽然绝大部分来到欧洲的亚洲人是目不识丁的农民,刚出发到欧洲时,可能对本国或世界都没有清晰的概念,但是他们在亚洲新的国家认同的发展中,在亚洲的国际化进程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在欧洲的个人经历,以及与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及其他国家工人每日并肩工作,使得印度人、中国人、越南人对于自身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作为国际大家庭之一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看法。透过他们自身的体验,以及从与他们相处的基督教青年会干事们和其他本国精英那里学习到的知识,这些人最终成为亚洲和世界的新公民,对于亚洲及其在世界的地位形成新的理解和认知。在相当大程度上,这些亚洲人的欧洲之旅实质上直接引导并参与了本国成为国际秩序新成员和民族发展历史中的新旅程。这些劳工为帮助改变自己所在的国度在国内及国际间的形象作出了直接的贡献。亚洲人在欧洲度过的大战岁月促成和导致了第一次如此众多的亚洲老百姓与西方直接接触。毫无疑问,这一经历不仅为他们观察和体验在另一文明中的人生生活提供了机会,而且也为他们向西方展示亚洲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提供了机会。当他们回国时,他们带回了新观念、新思想。换句话说,前往欧洲拯救协约国的亚洲人不仅仅只是普通士兵或劳工;他们是参与世界事务的第一波新亚洲人,并为建立新的国家认同和民族发展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④。

三、亚洲的集体憧憬与失望

一战结束后,中国人欣喜若狂,全国放假三日以示庆祝,以为从此公理战胜了强权,梦想中国在战后的和平会议上将能讨回公道,并将以平等一员跻身国际社会。日本更是充满期待,认为日本的强国梦即将实现,西方列强不仅会把日本在山东的权益合法化,日本更会从此成为与列强平起平坐的世界强国。印度和越南的民族主义者们也对战后国际秩序充满憧憬,以为他们为战争所作的牺牲以及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国际新秩序将会为他们赢得自治和独立。朝鲜人虽然与一战本身关联不大,但与中国人、印度人、越南人一样,认为威尔逊的新主张可以帮助朝鲜赢得独立。

然而,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这些国家在巴黎和会上都经历了巨大的失望。英国无视印度的巨大牺牲,对印度的民族自治诉求视若罔闻,甚至对其进行武力镇压。胡志明在巴黎和会期间十分活跃,并提交越南自治的诉求,但法国当局及列强对之根本不予理睬。朝鲜人则在1919年3月1日发动了全国性独立运动,虽揭开了声势浩大的独立运动的序幕,但很长时间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前面提到,几乎所有印度政治精英们都支持印度人参战,并力图把印度的参战同印度人战后争取民族独立和平等地位连在一起。他们希望战后英国会报答印度人在战争中的努力和牺牲,给印度人自治。战争无疑唤醒了印度人的民族感和民族主义。同其他亚洲人一样,印度人对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国际新秩序以及战后和平会议特别充满期待。不少印度人对威尔逊的“十四点”寄望很高,认为威尔逊会支持印度人民的正当诉求。一名印度人写信给威尔逊说:“阁下,印度人的心在痛,并向您哭诉,他们相信您是上帝派来重建世界的使者。”泰戈尔也对威尔逊崇拜有加,打算把他1917年出版的《民族主义》一书题献给威尔逊^⑤。威尔逊当时在印度的威望如此之高,以致印度著名政治家及学者V.S. 斯林瓦斯·萨斯特里(V. S. Srinivas Sastri)在亚洲出版的《威尔逊战时演说集》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感叹道,如果威尔逊总统有机会访问亚洲国家的话,“我们简直无法想象亚洲人民欣喜若狂的画面。其场面可能如同人类的一位导师、耶稣基督或佛祖回家一样”^⑥。

遗憾的是,尽管印度人为一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英国在战后并未同意印度独立或自治。在战争期间,协约国的政客们曾大力强调其战争的目的与正义、自由、民主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些概念因此已经成为“在印度家喻户晓的名词”^⑦。但是,战争结束后,英国不仅没有让印度自治,反而变本加厉,在1919年3月通过“鲁拉特法案”,对印度实行高压和残杀政策^⑧。泰戈尔极其愤怒,他在1919年5月30日写道,“我们的统治者对我们的普遍愤怒置若罔闻”,指责英国政府对印度人的极大不公。为此他愤而放弃英国王室授予的骑士荣誉。在巴黎和会上,所谓

的“威尔逊时刻”(Wilsonian Moment),其实不过是一纸空言、黄粱一梦而已。印度人在巴黎和会上并未得到自治,其民族自决的美梦彻底落空。前面提到的美国杰出印度史学者沃尔珀特指出,对印度人来说,如果说一战给他们带来了太多太多的期望的话,战后发生的一切则把这些期望“残酷地粉碎了,到了1919年,印度所经历的[英国]后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合作和爱德华时代的斯文优雅已经荡然无存”^⑤。

的确,一战的结束没有给印度带来自治,而是血腥镇压。一战后的印度人为此失望,以致他们不再同英国统治者合作,转而走向非暴力不合作运动^⑥。印度国大党直到一战结束前,一直是英帝国统治印度的支柱,但一战后却成为英帝国的死敌,开始为印度独立而奋斗。国大党在其1919年12月召开的会议上,鉴于威尔逊总统、劳合·乔治和英国其他政治家宣称,为了确保未来世界和平,“民族自决的原则必须对所有进步国家适用”,国大党专门为此通过决议,呼吁要求各国承认印度为进步国家,赋予印度人民民族自决的权利^⑦。民族独立成为国大党的重要追求。甘地在一战后成为印度独立运动的领袖。他在一战结束后意识到,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是不可名状的“不道德,不公正和自高自大。它用一个谎言来代替另一个谎言,用暴力执政。如果[印度]人民对此宽容而不抗争,我们将永远不会进步”^⑧。甘地因此也从一战期间支持印度在英帝国统治下的地位,义无反顾地变为持反对立场^⑨。二战期间成为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当时因此谴责甘地是一个“长于煽动的苦行僧”^⑩。我们无疑可以得出结论说,虽然印度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于1947年独立,但印度民族独立的种子是在一战中生根发芽的,一战对印度历史的重要意义因此昭然若揭。

在所有在法国的越南人中,没有人比一个名叫胡志明的人更有影响了^⑪。胡志明原名阮必成,在巴黎和会期间改名阮爱国,后来以胡志明著名于世。胡志明在一战结束后认为这是越南追求自治或独立的最好时机,他同其他在法国的越南民族主义者合作,向巴黎和会提交了一份越南民族自决提案。该

提案明显受到威尔逊新国际秩序观点的影响,它并非要求越南独立,而是希望越南在战后得到自治、平等和政治自由。提案主要有以下要求:(1)大赦越南政治犯;(2)在法律上赋予印度支那人与欧洲人同等地位;(3)新闻和舆论自由;(4)结社自由;(5)移民和国外旅行自由;(6)在印度支那各省建立技术和职业学校以及授课自由;(7)建立法治;(8)选举越南代表团参加法国国会^⑫。遗憾的是,法国政府及巴黎和会对这份极其温和的提案置若罔闻,根本不予理睬^⑬。胡志明意识到,所谓的“民族自决纯属欺人之谈,越南人同其他各国人民一样被威尔逊欺骗了。所谓‘威尔逊主义’只不过是一个大骗局而已”^⑭。对胡志明及其他越南民族主义者而言,巴黎和会告诉大家,自治不能靠西方列强施舍,民族独立和国家命运要靠自己去争取、去奋斗。因此,如同印度和中国一样,一战后,以胡志明为代表的越南民族主义者们决心投身抵抗工作,并最终像中国一样,走向了社会主义,走向了一条同西方国家分庭抗礼的不同政治道路。显然,一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标志着印度支那民族独立运动的转折点^⑮。

一战作为巨大历史转折点这一观点也适用于时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前面提到,朝鲜与一战的直接关系并不大,但威尔逊的新国际秩序观点问世以后,其在朝鲜民族主义者心中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他们开始思考如何抓住时机寻求朝鲜民族自决,李承晚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对李承晚等人来说,威尔逊的民族自决的说法绝对适用于朝鲜。李承晚本人甚至认识威尔逊,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时,威尔逊任该校校长。因此李承晚认为朝鲜无论从什么角度都应该能够得到威尔逊的同情和支持^⑯。所以,一战甫一结束,李承晚等人立刻同威尔逊联系,数次写信给威尔逊,寻求其对朝鲜独立事业的支持。例如,在1918年11月25日致威尔逊的信中,他们写道,“我们是一群致力于自治和政治独立的朝鲜普通人,深知阁下扶持正义,支持各民族不论强弱,一律平等”,“我们呼吁威尔逊帮助朝鲜在巴黎和会上得到公平待遇”。在请愿信中,他们还指出,虽然朝鲜并未直接卷入一战,但威尔逊有道义责

任支持朝鲜的民族自治诉求,帮助朝鲜人解脱日本的殖民枷锁^⑥。

学界公认,朝鲜人民对威尔逊的国际新秩序的强烈热诚和信任,直接导致了1919年3月1日朝鲜要求民族独立的“三一运动”^⑦。“三一运动”的独立宣言中公开要求朝鲜独立^⑧。朝鲜各界特别是学生们,如同两个月后在中国爆发的“五四运动”中的学生群体一样,发挥了积极作用。实际上,“三一运动”不仅是越南人和中国人追求民族独立、民族自决的先驱,更是重要的榜样。一些中国民意领袖后来承认了“三一运动”的榜样作用。陈独秀、李大钊、傅斯年、毛泽东等人当时都高度赞扬“三一运动”。孙中山也公开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朝鲜独立问题。陈独秀称“三一运动”“伟大、诚恳、悲壮,有了正确的观念,用民意不用武力,开世界革命史的新纪元”^⑨。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第三号写道,朝鲜人民不甘心做日本的殖民地,“这回受了民族自决主义的激刺,忍禁不住。趁着欧和会议,上了一个请愿书……直到三月一日,朝鲜宣布独立,发宣言,定公约”。毛泽东预言“朝鲜的独立终有一日会要实现是可以决定的”^⑩。朝鲜人民的“三一运动”对越南和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无疑是一个楷模,具有启迪和榜样的作用。

朝鲜民族主义者们强烈要求列强允许朝鲜参加巴黎和会,但日本和美国立即拒绝了朝鲜代表到巴黎的请求。只有一位朝鲜人得以在巴黎为朝鲜自治奔走呼号。实际上,这位堪称唯一一位朝鲜代表的金奎植是在中国人的直接帮助下由上海来巴黎的。中国人为他安排了船票和旅行证件^⑪。当然支持朝鲜独立符合中国的利益,同时也可以孤立日本。在巴黎期间,金奎植为朝鲜民族自决大声疾呼,但可惜都如泥牛入海,没有取得任何效果。不过朝鲜人对自己在患难之时中国人仍出手相助是十分感激的。流亡上海的青年革命家朴宪永(别名金成三)于1919年10月在致金奎植的信中就明确指出,“中国虽为弱国,但却是我们最为可靠的朋友”^⑫。然而中国局限于自身的艰难处境,所做毕竟有限,金奎植在1919年5月告诉记者,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其满怀同

情,自不待言。但其自身问题尚在困难不定之中,在和会中力量不足,有时恐日人之鬼崇手段,借题发挥加害于自身要求之问题,故不能放手扶助吾人”^⑬。最终朝鲜的民族独立诉求在巴黎和威尔逊处都以完全失败而告终。

中国人对巴黎和会的巨大期望和失望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一章。至今为止,欧战时期是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中国全方位接受西方价值观并把自己的命运与威尔逊鼓吹的世界新秩序连在一起。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兴奋地拥抱威尔逊的世界新秩序蓝图。日后成为著名教育家、外交家的蒋廷黻就声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相信威尔逊总统吐出的每一个字”^⑭。威尔逊的主张最能吸引中国人之处在于他的世界新秩序理念,尤其是他建立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计划和民族自决权原则^⑮。中国或许是唯一一个对国际联盟充满信心并全力推动其建立的国家。不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中国人成立了各种团体研究国际联盟议题和大力支持国际联盟的建立。1919年1月25日,正当巴黎和会讨论成立委员会研究筹组国际联盟时,中国首席代表陆征祥宣布中国将“鼎力”支持国际联盟的成立^⑯,顾维钧也在会议上说:“正如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比中国人更渴望见到国际联盟的成立,也没有人比我们更乐于见到国际联盟委员会踏出实质性进展的一步。”^⑰

因此,出于对威尔逊的信任和对国际联盟和未来世界新秩序抱有美好憧憬,中国人对即将召开的和平会议充满期待,特别是获悉威尔逊总统本人将亲自出席巴黎和会消息时,他们更是欣喜若狂。中国希望利用参加战后和平会议让全世界听到它的声音和理想,及其收复中国过去所丧失的主权,要求以平等身份加入国际社会的决心。更为重要的是,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人积极参与战后新秩序的建立。例如顾维钧系起草国联宪章的15人委员会成员之一,对宪章的撰稿,贡献颇多。

不幸的是,中国对巴黎和会和新国际秩序的巨大期望遭遇到所谓的“大背叛”。在巴黎和会上,中国没有收回山东。列强对中国要求平等待遇、恢复

丧失的主权的要求更是充耳不闻。中国人当然对这一结局深感受挫和失望。这个痛苦事实迫使中国认识到强权依然胜过正义与公理。毛泽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曾一度梦想中国与美国建立某种程度上的同盟关系,对巴黎和会更是充满希望。在经历所谓巴黎和会出卖之后,毛泽东对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高度期望化为失望。他的结论是,“如外交上各种‘同盟’‘协约’,为国际强权者的联合”,唯有革命才能矫正这个既不理性又不公平的国际体系^⑧。在陈独秀心目中,威尔逊现在已成为“空大炮”,他的原则“一文不值”^⑨。全国各地的学生公开表示他们对威尔逊主义失败的失望。北京大学学生讽刺威尔逊为他理想中的威尔逊式世界秩序发明了一个新方程式:“14=0。”^⑩

巴黎和会对中国造成的一个重大影响就是西方在中国的形象与魅力受到严重损害。所谓“凡尔赛的背叛”促使许多中国精英人士质疑西方的价值观,怀疑中国认同西方的可能性。严复是以翻译许多西方著作闻名的学者,他认为西方在1919年的行为表明西方三百年的文明发展最后只归结为四个词语:自私、杀戮、无耻和堕落^⑪。更有人下定论,认为巴黎和约证明“威尔逊主义之中挫,帝国主义之制胜可也”,以压制德国和中国为基础的世界新体系撑不了太久。还有人警告说,国际联盟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中国必须靠自己^⑫。巴黎和会失败后,一些激进的中国人开始转向社会主义,1949年后,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如果说,印度、越南、朝鲜由于其殖民地的地位,中国因为积贫积弱,这些原因导致这些国家在巴黎和会陷于令人失望的处境的话,日本似乎应该心满意足才对,毕竟日本通过一战一跃而成为世界强国,并且如愿得到了在山东的权益。学术界因此普遍认为日本是巴黎和会的赢家。但日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同中国、越南和印度一样受挫,只不过是不同的挫败感罢了。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以成为世界上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一员为己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1899年西方列强同意放弃在日本的治外法权,1911年日本也从列强手中收回了关税自主权。

强加在日本身上的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无疑使日本在被西方接受为“文明”国家方面迈出了一大步。相比之下,中国直到1943年才废除了列强在华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一心要成为第一个加入西方列强俱乐部的非白人国家,成为同西方真正平等的一员。但在巴黎和会上,日本几次提交种族平等条款,每次都被西方列强拒绝。也就是说,无论日本如何努力,白种人的西方列强是不可能接受日本的平等要求的。1924年美国更是通过新的移民法律,将日本人置于同长期遭受歧视的中国人一样的地位。因此日本人的巨大失望也是可想而知的。他们意识到,西方列强根本不想给日本真正的平等地位^⑬。

对于日本人的“种族平等”的要求,其他亚洲人一样感同身受。毕竟早在1882年美国国会最先通过歧视中国人的排华法案,梁启超早在1890年代就多次著文呼吁中国与日本联手合作,共同抗击西方的种族歧视和促成黄种人的独立^⑭。所以在巴黎和会上,日本虽然是中国的对手,但在“种族平等”问题上,中国代表团一直支持日本的提案^⑮。印度在巴黎和会上也支持日本的种族平等提案。同中国人和日本人一样,印度也一直饱受西方列强的种族歧视。在1919年4月讨论如何应对日本的“种族平等”提案时,印度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S.P.辛哈表示,作为亚洲人,他有责任在会议上支持日本的提案^⑯。因此,日本的种族平等的诉求和亚洲国家对其支持,实际上也是亚洲共有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在巴黎和会上“种族平等”提案几遭挫败的事实,清楚地告诉日本人,无论日本如何强大成功,白种人还是视其为二等国家,不愿与日本平起平坐^⑰。这一挫败对当时参加巴黎和会的近卫文磨打击极大。他在“关于巴黎和会的印象”一文中写道,日本要想真正成为平等国家,它就必须打破西方列强一手遮天的国际秩序,重划世界政治版图。近卫文磨后来在二战期间三度成为日本首相。他宣称,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拒绝接受日本提出的种族平等提议,在相当大程度上为日本在1930年代用战争手

段同西方分庭抗礼是密切相关的^⑧。1933年日本戏剧性地宣布退出国联,日本驻国际联盟代表明确表示,1919年列强拒绝接受日本的“种族平等”提案,明显意味着西方对日本的侮辱和打压,日本退出国联就是对这一打压的正式反应。日本天皇也在1946年宣称,大东亚战争的根本原因源于巴黎和会^⑨。西方学者 Gerrit W. Gong 认为,日本在巴黎和会中种族问题提案的挫败,促成了日本意识到它要自己动手重整新的国际秩序,并最终导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⑩。

日本甚至与中国等国家一样,在巴黎和会后产生了国家认同危机。换句话说,日本的失望也还体现在其国家认同危机上。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以德国为模仿对象,一心效仿德国,以日本式的“铁血政策”步德国后尘,日本的明治宪法也是以德国的宪法为母本。日本甚至以“东方的普鲁士”自居。德国俨然是日本的“Sensei”即“先生”^⑪。但一战结果是德国大败,德国及其军国主义模式也因此遭到世人唾弃,从而导致一些日本人认为自己的国家选错了模仿认同对象。与此同时,日本不少人在一战后也对日本长期以来实行的外交方针开始质疑^⑫。日本著名历史学者萩原延寿就认为,直至一战结束时,日本外交的“中心”一直是日英同盟,但一战后英国放弃了日英同盟,日本外交因此无所适从,失去了方向。这种在外交方针方面的失落对日本来说,也是一个严重挑战^⑬。诚如哈佛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入江昭教授所言:“一战后日本外交面临的首要挑战,就是如何界定其意识形态基础。因为旧的帝国主义外交正为美国、俄国、中国及其他国家所提倡的外交方针所取代。”^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尽管亚洲五个国家在巴黎和会上地位不同,待遇也不一样,但它们同样经历了巨大的期望和失望。如果不从“共有历史”角度,我们恐怕很难意识到这一点。

四、结论

长期以来,西方的一战著作很少有涉及亚洲国家的内容,亚洲国家对其与一战关系的研究也一直乏人问津。直到今天,我们仍很难读到越南和朝鲜

学者撰写的本国与一战关系的著作。印度与一战关系方面的著作虽不少,但大都是在英帝国的语境或框架之下,缺乏把印度作为亚洲一员的视角。中国学者因长期局限于列宁有关一战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的论述,同时也因对一战期间的北京政府缺乏公正认识,以致无法在一战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日本学者虽在一战研究方面相对而言取得不少成果,但几乎无人从日本作为亚洲国家和亚洲共有历史角度来研究日本与一战的关系。甚至在一战爆发之时,亚洲国家对其与亚洲关系的定位也是模糊不清,除中国和日本精英人士对亚洲的定位和地位有些分析与论述,印度、越南、朝鲜等国家则因其殖民地的处境,很少关注自己作为亚洲国家的问题。

本文认为,通过“共有历史”角度透视亚洲与“一战”的关系,可以更为明晰地描述和分析亚洲与世界接轨及参与重建西方文明的精彩历史,让我们得以清楚地意识到亚洲与一战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亚洲史乃至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亚洲的参战才使欧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并改变了这场战争对于亚洲和世界的意义和影响,为战后和平会议及新兴的世界秩序注入了新内容和新视角。换言之,对亚洲而言,20世纪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

到目前为止,亚洲对一战的参与被摒弃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之外。通过研究亚洲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可以恢复一战在亚洲历史和世界历史中十分重要的历史记忆。亚洲与这场战争之间的全面交汇,象征着亚洲走向国际化这一漫长旅程的开始。换句话说,一战一举把亚洲带进世界,并且使这场战争成为亚洲自身历史的重要部分。透过大战,亚洲踏上一个新旅程,也就是走上国际化和民族复兴的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亚洲在其近现代史上第一次明确表达要以平等地位加入国际社会的愿望并为之积极采取行动。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亚洲追求国家认同及努力增强亚洲在国际上的地位过程中的一个分水岭,那么亚洲国家通过大战斗力图参与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壮举,无疑也是世界史中一份

影响深远的遗产。不论我们如何评论一战对亚洲的意义,或亚洲对一战的贡献,我们必须在一战研究中恢复亚洲与一战关系的真实记忆。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进而理解一战的世界影响,并通过研究亚洲与一战的关系,填补世界战争史、外交史、社会史研究上的一项空白。

注释:

①Edward Wong, "China's Hard Line: 'No Room for Compromise,'"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8, 2014, A4.

②详见徐国琦:《“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国际史研究方法及其应用》,《文史哲》2012年第5期;徐国琦:《试论“共享的历史”与中美关系史研究的新范式》,《文史哲》2014年第6期;徐国琦:《作为方法的“跨国史”及“共有的历史”》,《史学月刊》2017年第7期。

③本文系在拙作“Asia,” in Jay Winter ed.,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vol. 1*(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以及 *Asia and the Great War: A Shared History*(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研究基础上凝炼而成,并增加了一些最新想法和材料,特此说明。

④Erez Manela, *The Wilsonian Moment: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81.

⑤Stanley Wolpert, *A New History of India*(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310.

⑥详见 Santanu Das, *1914–1918: Indian Troops in Europe* (Ahmedabad: Mapin Publishing, 2015).

⑦Timothy C. Winegard, *Indigenous Peoples of British Dominions and the First World War*(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11.

⑧Xu Guoqi, *Asia and the Great War: A Shared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61.

⑨Bhupendranath Basu, *Why India is Heart and Soul with Great Britain*(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14), 8.

⑩Shyam Narain Saxena, *Role of Indian Army in the First World War*(Delhi: Bhavna Prakashan, 1987), 6.

⑪S. P. Sinha, *The Future of India: Presidential address to 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by Sir on the 27th December 1915* (London: Jas. Truscott & Son, 1916), 7, 1, 2–3, 44.

⑫Santanu Das, *1914–1918: Indian Troops in Europe*, 149.

⑬“War Poems from the Times” issued with the *Times*, August 9, 1915, 10. Quote from Santanu Das, *1914–1918: Indian Troops in Europe*, 11.

⑭Bhupendranath Basu, *Why India is Heart and Soul with Great Britain*, 1.

⑮B. R. Nanda, Gokhale: *The Indian Moderates and the British Raj*(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446; B. R. Nanda, *Gandhi, Pan-Islamism, Imperi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India*(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63.

⑯B. R. Nanda, *Mahatma Gandhi: A Biography*(Boston: Beacon Press, 1958), 97, 105.

⑰Santanu Das, “Indians at Home, Mesopotamia and France,” in Santanu Das, ed., *Race, Empire and First World War Writing*(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73.

⑱Jim Masselos, *Indian Nationalism: An History*(New Delhi: Sterling Publishers, 1985), 137.

⑲The London Correspondent of the *New York Times*, *Loyal India: An Interview with Lord Hardinge of Penshurst, ex-governor-general of India*(London: Sir Joseph Causton & Sons, 1916), 11.

⑳Nanda, Gokhale: *The Indian Moderates and the British Raj*, *ibid*, 446.

㉑Manela, *The Wilsonian Moment*, 82.

㉒Albert Sarraut, *La Mise En Valeur Des Colonies Francaises*(Paris: Payot, 1923), 463.

㉓Pierre Brocheux, *Ho Chi Minh: A Biography*(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12.

㉔William J. Duiker, *Ho Chi Minh*(New York: Hyperion, 2000), 53.

㉕See Chong-sik Lee, *The Politics of Korean Nation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101–102.

㉖关于中国与一战关系的详细研究,请参阅 Xu Guoqi, *China and the Great War: 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和 *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两书。

㉗Frederick Dickinson, *War and National Reinvention: Japan in the Great War, 1914–1919*(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35.

㉘梁启超:《改革起源》,《饮冰室合集》第六册,北京:中华

书局,1989年,第113页。

⑲泰国在一战期间也向欧洲战场出兵,但因为到达太晚,未能赶上战斗。中国政府愿意向欧洲战场出兵,但因遭到日本强烈反对,未能成行。详见 Xu Guoqi, “The Great War and China’s Military Expedition Plan,”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 72, no. 1(January 2008).

⑳ DeWitt C. Ellinwood, *Between Two Worlds: a Rajput Officer in the Indian Army, 1901–1921, Based on the Diary of Amar Singh of Jaipur*(Lanham, MD: Hamilton Books, 2005), 358.

㉑ For details on this, see No Author, *Our Indian Army: a Record of the Peace Contingent’s visit to England 1919*, issued for the India office by Adams Bros & Shardlow Ltd(London: 1920); see also George Morton-Jack, *The Indian Army on the Western Front: India’s Expeditionary Force to France and Belgium in the First World War*(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299.

㉒ Morton-Jack, *The Indian Army on the Western Front*, 299.

㉓ Morton-Jack, *The Indian Army on the Western Front*, 1, 17.

㉔ De Witt Mackenzie, *The Awakening of India*(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17). 159.

㉕ DeWitt C. Ellinwood and S. D. Pradhan, *India and World War I*(New Delhi: Manohar, 1978), 22.

㉖ Santanu Das, “Indians at Home, Mesopotamia and France,” in Santanu Das, ed., *Race, Empire and First World War Writ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84.

㉗ Ellinwood, *Between Two Worlds: A Rajput Officer in the Indian Army*, 356, 370, 392, 403, 404.

㉘ Kimloan Vu-Hill, *Coolies into Rebels: Impact of World War I on French Indochina*(Paris: Les Indes savantes, 2011), 85.

㉙ Hill, “Strangers in a Foreign Land,” in Santanu Das, ed., *Race, Empire and First World War Writing*, 263.

㉚ 陈三井、吕芳上、杨翠华编:《欧战华工史料》,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第380–381页。

㉛ Richard Standish Fogarty, *Race and War in France: Colonial Subjects in the French Army, 1914–1918*(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8), 202

㉜ Vu-Hill, *Coolies into Rebels*, 111

㉝ Fogarty, *Race and War in France*, 202–212

㉞ Fogarty, *Race and War in France*, 209–210

㉟ Hill, “Strangers in a Foreign Land,” 281; Vu-Hill, *Coolies into Rebels*, 50–51; Vu-Hill, *Coolies into Rebels*, 10.

㊱ 详见徐国琦:《为文明出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线

华工的故事》,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7年。

㊲ 徐国琦:《为文明出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线华工的故事》,第208页。

㊳ “The Chinese Laborers in France in Relation to the Work of 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Report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of North America of Special Mission of Dwight W. Edwards in France April 13–May 11, 1918,” YMCA Archives, box 204, folder report 1919.

㊴ 关于一战如何改变亚洲人的思想和观念,请参阅下述拙著: *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a and the Great War*, 《为文明出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线华工的故事》。限于篇幅同时也避免重复,在此不展开论述。

㊵ Manela, *The Wilsonian Moment*, 78, 92.

㊶ Manela, “Imaging Woodrow Wilson in Asia: Dreams of East–west Harmony and the Revolt Against Empire in 1919,”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December 2006), 1327.

㊷ Vaman Govind Kale, *India’s War Finance and Post-war Problems*(Poona: The Aryabhushan Press, 1919), 150.

㊸ B. R. Nanda, *Gandhi, Pan-Islamism, Imperi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India*(Bomba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86.

㊹ Stanley A. Wolpert, *A New History of India*(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314.

㊺ Saroj Sharma, *Indian Elite and Nationalism, A Study of Indo English–Fiction*(Jaipur: Rawat Publications, 1997), 75.

㊻ Manela, *The Wilsonian Moment*, 175, 96.

㊼ Jim Masselos, *Indian Nationalism: An History*(New Delhi: Sterling Publishers, 1985), 163.

㊽ Wolpert, *A New History of India*, 315.

㊾ Masselos, *Indian Nationalism: An History*, 151.

㊿ Duiker, *Ho Chi Minh*, 56.

① Hue– Tam Ho Tai, *Radic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Vietnamese Revolu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69.

② Margaret MacMillan, *Paris 1919: Six Months That Changed the World*(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2), 59; “Claims of the Annamites,”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Kew Garden): FO 608/209.

③ Ho Chi Minh, *Down With Colonialism*(New York: Verso, 2007), 5–6.

④ Vu-Hill, *Coolies into Rebels*, 9.

⑤ Frank P. Baldwin, *The March First Movement: Korean Challenge and Japanese Response*. Ph. D thesis, Columbia

University, 1969, 16.

⑥⑥ Young Ice Lew, Young Seob Oh, Steve G. Jenks and Andrew D. Calhoun, eds., *The Syngman Rhee Correspondence in English, 1904–1948*, Institute for Modern Korean Studies, Yonsei University, 2009, 1: 57.

⑥⑦ Ku, Tae–vol. *Korea under Colonialism: The March First Movement and Anglo–Japanese Relations*(Seoul: Published for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Korea Branch by Seoul Computer Press, 1985), 37.

⑥⑧ For the complete text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see Henry Chung, *The Case of Korea: a collection of evidence on the Japanese domination of Korea, an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Korean Independence Movement*(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21), 199–203.

⑥⑨《每周评论》,1919年3月23日社论,第9页。

⑦⑩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编:《湘江评论·新湖南·新时代》,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7–48页。

⑦⑪ Baldwin, *The March First Movement*, 36.

⑦⑫ Young Ice Lew, Young Seob Oh, Steve G. Jenks and Andrew D. Calhoun, eds., *The Syngman Rhee Correspondence in English, 1904–1948*, 4: 435

⑦⑬《民国日报》,1919年8月14日。转引自石源华:《中国现代各政党、政治集团对韩关系比较研究》,石源华主编:《韩国独立运动血史新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页。

⑦⑭ Min–Chien T. Z. Tyau, *China Awakened*(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2), 268.

⑦⑮关于中国与国联研究,可参考唐启华:《北京政府与国际联盟,1919–1928》,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张力:《国际合作在中国:国际联盟角色的考察,1919–194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83(1999年)。

⑦⑯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FRUS,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1919*, vol. 1, 186.

⑦⑰ Koo and others, *China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London: G. Allen & Unwin Ltd., 1919), 3–5.

⑦⑱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湘江评论》第2号(1919年7月21日),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编:《湘江评论·新湖南·新时代》,第20页。

⑦⑲《每周评论》第20号(1919年5月4日)。

⑦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第1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22页。

⑧①王弼主编:《严复集》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

691–692页。

⑧② Xu Guoqi, *China and the Great War*, 244–277.

⑧③ Tadashi Nakatani, “What Peace meant to Japan: The Changeover at Paris in 1919,” in Tosh Minohara, Tze–ki Hon, and Evan Dawely, eds., *The Decade of the Great War: Japan and the Wider World in the 1910s*(Leiden; Boston: Brill, 2014), 171–172.

⑧④详见梁启超《论中国之将强》《论中国人种之将来》《论支那独立之实力与日本东方政策》等文章(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二册,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60年,第11–17、48–54、67–71页)。

⑧⑤ Entry March 26th, 1919, David Miller, *My Diary at the Conference of Paris with Documents*(New York: the Appeal Printing Company, 1924), 1: 205.; see also David Miller, *The Drafting of the Covenant*(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28), 1: 336. Miller, *The Drafting of the Covenant*, 2: 325; Miller, *The Drafting of the Covenant*, 1: 336.有关中国对日本种族平等提案的支持,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编:《秘籍录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82–83、129页等电文。

⑧⑥ Hugh Purcell, Maharajah of Bikaner, India. *Makers of the Modern World*(London: Haus, 2010), 101.

⑧⑦ The Japan Times, 19 April 1919; Naoko Shimazu, Japan, Race, and Equality: *The Racial Equality Proposal of 1919*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179–181.

⑧⑧ Yoshitake Oka, Konoe Fumimaro: *A Political Biography*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83), 14–15.

⑧⑨ Kenneth Pyle, *Japan Rising: The Resurgence of Japanese Power and Purpose*(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7), 158.

⑧⑩ Gerrit W.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63; 199.

⑧⑪ Bernd Martin, *Japan and Germany in the Modern World* (Providence: Berghahn books, 1995), 32.

⑧⑫ Rustin Gates, “Out with the New and In with the Old,” in Tosh Minohara, Tze–ki Hon, and Evan Dawley, eds., *The Decade of the Great War*, 75.

⑧⑬ Hagihara Nobutoshi, “What Japan Means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Hagihara Nobutoshi, Akira Iriye, Georges Nivat, Philip Windsor, eds., *Experienc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85), 21.

⑧⑭ Akira Iriye, *Japan and the Wider World: from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London: Longman, 1997), 50.